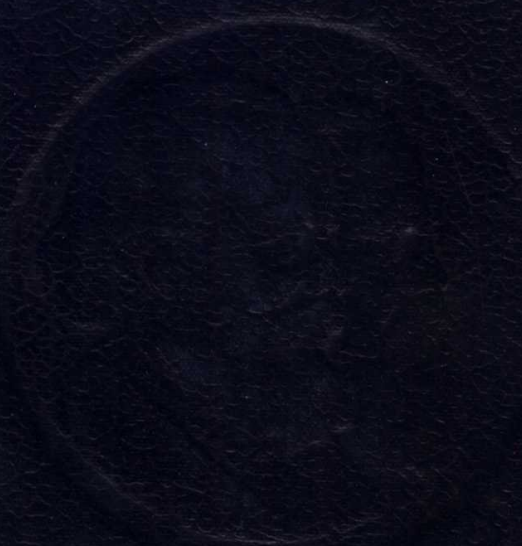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六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6 \frac{3}{4}$ · 插页 9 · 字数 619,000

1961年8月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02 定价（四）2.90元

第六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收集了他們在1848年11月至1849年7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同第五卷一样，第六卷所包括的大部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民主运动中代表无产階級观点的唯一报纸——“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用唯物主义辯证法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揭示了政治冲突的实质，认为它是尖銳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判定了政治舞台上階級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并据此拟定出无产階級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同阶段上的策略路綫。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論上概括了群众在革命时期的丰富經驗，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的几篇文章是馬克思在普魯士发生尖銳的政治危机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写成的。馬克思分析了逐渐低落的欧洲革命的进程，指出了反革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把普魯士所策划的政变看作是欧洲悲剧的第三幕；第一幕是法国无产階級在六月的日子里的失败，第二幕是1848年11月1日革命維也納的陷落。

馬克思力求通过“新萊茵报”向人民群众預告即将来临的决战，并教导他們准备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在“柏林的危机”、“柏林

的反革命”以及其他文章中，馬克思闡明了 1848 年 11 月普魯士的政局，并证明王权和普魯士国民議會之間业已成熟的冲突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馬克思要求普魯士国民議會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大臣們作为国事犯加以逮捕，革除一切不服从国民議會決議的官員的职务，并宣布他們不受法律的保护。他提出拒絕納稅的口号，以便剝夺反革命政府反对人民的手段之一。馬克思认为，由于拒絕納稅而必然展开的运动，是激发群众革命毅力的手段，是革命新阶段的开始，在順利的情況下这个阶段的結局应当是推翻王权和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

馬克思在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見本卷第 24 頁）中号召各民主团体举行民众大会来鼓励居民拒絕納稅。在区域委员会的第一个呼吁书中，馬克思警告說不要用暴力手段抗拒納稅，以免在萊茵省发生孤立的和分散的起义。当普魯士国民議會本身通过了拒絕納稅的決議后，这一运动已开始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质的时候，馬克思在第二个呼吁书（見本卷第 39 頁）中号召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征稅，号召組織武装的民团以反击敌人，并成立安全委员会。馬克思认为安全委员会是临时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它所頒布的命令应当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命令。这种革命政权机关应当代替三月革命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反动官僚机构。同仅仅号召消极反抗征稅的普魯士国民議會完全相反，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号召“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則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犢的反抗一样”。（見本卷第 38 頁）

馬克思在“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民主主义者萊茵区

域委員會的呼吁书中，为全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拟定了坚决大胆的行动綱領。这些文件对于研究馬克思在德国革命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普魯士国民議會仅限于号召消极反抗；萊茵省所掀起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普魯士其他省份沒有得到积极的支持。結果反革命获得了新的胜利：1848年12月5日普魯士国民議会被解散。馬克思在“反革命政变”一文中写道：“国民議会长期以来軟弱怯懦，現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現在它成了这种阴谋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見本卷第117頁）

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孟德斯鳩第五十六”、“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康普豪森”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在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审訊中的发言，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普魯士反革命获胜的原因；他揭示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它与自己历史上的先驅者——十七世紀、十八世紀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建立了适合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政治制度，而三月革命“只是改組了政治上层，而沒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軍隊、旧檢察机关”。（見本卷第278頁）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确实領導了革命运动，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却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協議的办法来取得政权。馬克思指出，康普豪森和汉澤曼在革命中采取的立場不能用这些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品质来解釋，而應該用他們所代表的那个階級的物质利益来解釋。普魯士的資產階級由于害怕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不惜向旧社会势力作任何妥协。資產階級無論如何要保存“法制基础”，因此拒絕向封

建社会势力作坚决斗争，而把稍加改头换面的旧的地主官僚国家保存下来。由于害怕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侵害，普鲁士资产阶级力求保存封建所有制，从而抛弃了它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这样它便预决了自己的必然失败，而为反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揭露了声名狼藉的“法制基础”的真实含义，那就是企图把旧法律强加于通过革命来确立自己的法律的新社会。馬克思发展了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他证明说：与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就会造成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解决。

馬克思总结了半途而废的三月革命，证明坚持“法制基础”和臭名昭彰的“协商论”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尖锐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果然于1848年11月在普鲁士爆发，而以12月5日的政变告终。

馬克思把王权同国民议会之间的这个冲突看作是两个国家政权的斗争，两个元首的斗争。但是，两个自主的政权不能同时并肩地在同一个国家里行使权力。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由物质力量来解决。馬克思揭示了这一斗争的深刻的阶级根源。他指出，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议会党团的政治冲突，而是两个社会的冲突，是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王权——旧的封建贵族社会的代表和国民议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之间的斗争。

馬克思駁斥了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控告，证明拒絕納稅是人民自然的和合法的自卫手段，人民有权用暴力还击暴力。馬克思始終不渝地坚决捍卫人民的主权，捍卫人民进行革命的权利以及人民积极干預历史进程的权利：“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見本卷第 305 頁）

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审訊中的发言，以及他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审訊中的发言，都是利用法庭来宣傳革命观点，控告当局和揭露反革命計劃的光輝范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审訊中的发言，捍卫了革命报刊的权利，他們认为革命报刊的首要任务是破坏現存反动政治制度的全部基础。

在普魯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欧洲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經濟落后的德国，只能决定于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

馬克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考察了 1848 年欧洲革命和反革命所經歷的道路。馬克思一再回顾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敗，这次失敗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法国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失敗，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則引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失敗，并使曾經以爭取独立的斗争来响应二月革命的各被压迫民族遭到了新的奴役。所以馬克思強調指出，欧洲革命的命运同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結合在一起。

馬克思在总结欧洲革命时得出結論說：“1848 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贏得了东西，而是他們失去了东西，——他們丟掉了幻想。”（見本卷第 162 頁）富于遐想、良好願望和華麗辞藻的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剧的历史进程和殘

酷的反革命无情地踐踏无遺了。馬克思号召人民要吸取反革命所提供的教訓，以便在将来的战斗中及时而大胆地运用这些教訓。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魯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写的全部文章，都对胜利的法国无产階級革命的临近充滿了希望，因为这次革命会推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革命高潮的出現。这个新的高潮，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应当导致德国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无产階級革命的轉变。关于資产階級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思想，在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根据 1848—1849 年革命經驗所制定的不断革命的理論中得到了发展。

馬克思认为資产階級英国是法蘭西无产階級革命的主要敌人，因为資产階級英国“把許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当时馬克思认为，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而这次大战会給英国无产階級政党——宪章派的胜利起义創造条件。总结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的“革命运动”一文的結尾这样写道：“法国工人階級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見本卷第 175 頁）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1848—1849 年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对欧洲革命前景的判断中，对欧洲大陆各国經濟发展的成熟程度作了某些过高的估計，由此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即将来临的論点。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法国无产階級的革命主动性上，同时也密切注意欧洲其他国家的斗争进程。他們热烈支持被压迫民族爭取自由的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文章里捍卫波兰的独立，对波兰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对欧洲民主的意义給予很高的評价。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羅馬宣布成立共和

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深切的同情論述了意大利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皮蒙特王权的背叛政策。恩格斯写道：“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見本卷第 457 頁）恩格斯說：意大利人民不應該只用正規軍来抵抗奧軍和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而應該掀起群众起义，开展革命战争、游击战争、真正的民族战争，以便永远消灭奥地利的压迫。

本卷有許多文章（“匈牙利的斗争”、“‘科倫日报’論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等）是論述匈牙利革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同情关注匈牙利人民反对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分析了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进程，认为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善于采取許多措施以保证农民支持革命的作法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強調了匈牙利战争的人民性质和游击性质，并对科苏特政府所采取的坚决的革命的对敌斗争方法給以很高的评价。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問題看作是整個欧洲革命問題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依据民族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成为誰的工具，把民族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他們把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归为革命的民族，因为这些民族的斗争削弱了当时欧洲几个主要的反动国家——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1848年夏天，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关怀捷克的民族运动，特别是布拉格的起义。但是，在这次起义被镇压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分子在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中占了上风；結果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沙皇政府便利用了这些民族来镇压德国和匈牙利的革

命。由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客观性质发生了变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民族看作是反革命的民族。

列宁研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对待民族問題的立場后，写道：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 1848 年無論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說，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 1848 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44 頁）

在“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一方面对奥地利境内的許多斯拉夫民族的运动給予了正确的历史评价，把它看作是違反当时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利益的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却作出了某些錯誤的論断。恩格斯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这些民族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不能起进步作用，似乎这些民族注定要遭到灭亡，而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存在。在这些文章中，还片面地把德国人征服許多斯拉夫民族的过程描繪成进步的，傳播文化和文明的过程。这种說法是同恩格斯自己在其他文章（見第 5 卷“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和本卷“波茲南”等文）中描繪的德国諸邦对东欧实行搶劫掠夺政策的情景相矛盾的。恩格斯关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前途的观点，是和他关于小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分不开的。恩格斯认为，以后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向是集中，这种发展进程会使这些弱小民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被大的、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的民族所并吞。恩格斯列举了苏格兰的盖尔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作为例子。对于美国侵占墨西哥的部分領土，恩格斯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評价的。但是恩格斯在估計弱小民族的命运时，并没有考虑到資本主义除了集中的趋向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向——弱小民族爭取独立的斗争，它們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恩格斯关于某些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作用的錯誤观点，也是因为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問題的研究在 1848—1849 年間还处于开始阶段，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經驗还比較少。同时还应当指出恩格斯文章中关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一些保留意見。“如果斯拉夫人在他們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們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們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見本卷第 334 頁）奥地利境內各斯拉夫民族在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之后的百年来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民族的生命力和坚强性，他們已經爭得了自由和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胜利地建設着社会主义社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系統地深刻地闡明了欧洲各国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斗争，同时也极其重視对普魯士反革命政变后的事件进程的分析。他們认为德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一步一步地捍卫自己在报刊、人民集会和議會中保留下来的陣地。

“三个新法案”、“霍亨索倫王朝的总改革計劃”、“霍亨索倫王朝的出版法案”等三篇文章尖銳地批評了曼托伊費尔政府提出的各种法案，这些法案堪称为对 1848 年 12 月 5 日国王欽賜的畸形

宪法的补充，它們必然把国家引回到旧普魯士立法的宗法式野蛮状态。

恩格斯的“第二議院的奏折草案”、“柏林关于奏折問題的辯論”、“柏林第二議院四月十三日會議”、“关于招貼法的辯論”等文章，是为了批評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活动而写的。恩格斯分析了第二議院的辯論，憤慨地指出，第二議院的議員們，其中包括极左派的代表，不但沒有公开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迎合議会的妥协迁就行为，节节让步。恩格斯譴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首領，这些“議會讲台上的初出茅芦的騎士們”，說他們希图用議會的方法来达到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即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的东西。本卷中收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議會主义，并拟定了革命的議員在議會中的策略，其主要特点就是要把議會內的活动同議會外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地結合起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1848—1849年的活动是同群众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848年春天，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时，无产階級分离涣散，政治觉悟不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組織松懈，人数又少。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階級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积极参加資產階級革命，并站在民主运动的极左翼。根据这一策略，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参加了民主团体，他們在民主团体中坚决地捍卫了革命无产階級的立場，对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沒有作任何原則性的让步，指出了他們的不彻底性，推动他們采取坚决行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场所，除了“新萊茵报”和科倫民主协会而外，还有科倫工人联合会。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力求通过工人联合会来提高科倫和全萊茵省工人的階級觉悟和組

織性。

在革命进程中，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提高了，他們日益深刻地了解到本階級的目的，并摆脱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响。斗争的經驗证明，在同反革命的决战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首領不可能是可靠的同盟者。由于情况的改变，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虽然在許多一般的政治問題（如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选举）上仍旧同民主派一起行动，但实际上他們在着手建立无产階級的独立政治組織。为了这个目的，他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組和加强科倫工人联合会。这些措施是在反对哥特沙克及其拥护者的派別活动和分裂活动的激烈斗争中得到貫徹的。（見本卷附录“科倫工人联合会分会的決議”，第699—701頁）

1849年春天，由于德国階級斗争日趋尖銳，匈牙利进行着革命战争，法国革命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因而更加迫切需要建立无产階級的独立組織。1849年4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在德国工人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支持下，退出了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从而在組織上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們断絕了关系。（見本卷第509頁）接着，他們所領導的科倫工人联合会通过了退出萊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以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总会建立联系的決議。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組織上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断絕了关系，但是以后在和共同敌人作斗争时并没有拒絕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行动。

三月革命发生一年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了策略，这是因为他們考虑到这个时期中德国階級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德国工人意識中的变化。德国工人意識中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萊茵报”促成的。“新萊茵报”愈来愈明显地表明它是革命无产階級的

机关报。

在“資產階級的文件”、“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科倫日報’論選舉”等文章中，馬克思用具体事实說明普魯士資產階級對待工人是極端殘酷无情的，揭露了他們假意討好無產階級的企圖，揭露他們在選舉前許下的要一舉解決“社會問題”的蠱惑性諾言。馬克思反對“科倫日報”關於“社會問題”的混亂論點時，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具体的階級性。他證明，雖然資產階級希望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投票擁護國王賞賜的憲法，但與資產階級的願望相反，這些階級所關心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國，因為這種國家形式能使他們有更大可能來保衛自己的利益。“全社會最激進、最民主的階級不正是這些階級嗎？特別革命的階級不正是無產階級嗎？”（見本卷第25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貫堅持的爭取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口號，不僅意味着要消滅腐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反動的地主階級的統治，同時也要用革命的方式解決德國的統一問題，即結束妨礙德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長期的分散狀態。

像在以前所寫的許多論文中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決反對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這兩個封建君主國之一的領導下“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的計劃（見“法蘭克福議會”一文）。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也反對德國南部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想把德國變為瑞士式的聯邦共和國的企圖。

恩格斯在被迫居留瑞士期間所寫的文章中（“昔日的公國”、“新的代表機構。——瑞士運動的成績”、“聯邦法院的選舉”、“聯邦委員會委員剪影”、“國民院”、“瑞士報刊”等）描繪出了瑞士政治生活的真實圖景，當時瑞士以資產階級聯邦共和國的典範聞名，就

像比利时以資產階級君主國的典范著稱一樣。恩格斯強調指出了當時小市民的瑞士的政治生活中地方的、州的局限性，指出了瑞士大多數政治活動家的特點：滿懷偏見、目光短淺、打小算盤和專重小節。

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決批駁了把德國變成瑞士式的聯邦共和國的小資產階級計劃，證明德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特點堅決要求消除國家的分散狀態、割據現象和小邦林立的局面，要求建立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強調，革命的德國為了捍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不僅要反對內部敵人，而且還要反對外敵，首先是反對歐洲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即資產階級的英國和封建專制的俄國。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俄國沙皇制度，把它看作是歐洲封建君主反動勢力的主要支柱，不摧毀這個支柱，歐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德國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統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用革命方法統一德國的主要內部障礙是霍亨索倫王朝的反動普魯士君主制度，這是舊的、封建社會腐朽力量的堡壘。“霍亨索倫王朝的豐功偉績”、“普魯士新憲法”、“新的軍法憲章”、“告我的人民”及其他文章，以鮮明的筆調描述了執政的普魯士王朝靠掠奪、欺詐、暴力起家的歷史，指出了它在窒息人民解放運動中所起的卑鄙作用。

統一德國道路上的另一個障礙是封建專制的奧地利。只要哈布斯堡帝國存在，就根本談不上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談不上在整個德國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批評了全德國民議會，因為它不僅不堅決消滅德國反革命勢力，反而包庇縱容它。“法蘭克福蛤蟆坑”的

議員們一味以庸俗教授的腔調空談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却放棄人民历来的基本权利——起义的权利（見“法兰克福議會”、“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維也納和法兰克福”、“普魯士給法兰克福諸君的耳光”等文）。后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总算制定了德意志帝国宪法，但这个宪法只不过是一紙空文，因为德国各邦君主不願意承认它。

1849年春天，在萊茵省和德国西部其他地区爆发了維護帝国宪法的人民起义。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觉得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局限性，但还是給以支持。他們說明，这一运动之所以具有群众性，是因为“每向統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稅迈进一步”。（見本卷第55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欢迎人民群众的日益壯闊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工人起了显著的作用。恩格斯积极参加了爱北斐特的起义。（見“爱北斐特”一文）

指导群众革命斗争的“新萊茵报”的剛毅勇敢和毫不調和的立場一开始就引起普魯士政府和司法当局的殘酷迫害。他們对报纸編輯进行了一連串的审讯。但是，1849年2月7日对“新萊茵报”的审讯和1849年2月8日对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审讯，結果都違反了普魯士政府的初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露性的发言贏得了旁听的公众的热烈欢迎，使得陪审法庭只好宣判他們无罪，也使“新萊茵报”編輯的声誉大大提高。

普魯士政府并没有放棄用各种方法迫使“新萊茵报”沉默的計劃。1849年5月萊茵省零散的起义失敗后，普魯士当局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普魯士。警察当局对馬克思及該报其他編輯的迫害，使“新萊茵报”在1849年5月19日停刊。